

北學南移

港台文史哲溯源
1949

(學人卷I)

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主編

1949年前後，
大批學者自中國南移至香港和台灣，
兩地學術文化為之大變！

通史大家錢穆如何建構出具有國家民族文化的新史學理論並實踐於著述？
儒家思想的弘大發揚源於其文化遺民不屈的信念與執守？
問融為一體的牟宗三，重新奠定了內聖通外王的現代儒學精神？

陳勇 盧雪崑 韓曉華 何一 岑詠芳 楊祖漢
周國良 賴柯助 周栢喬 呂銘威 楊俊強 何仁富

—— 深刻析論

北學南移

港台文史哲溯源

(學人卷I)

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主編

北學南移 ——港台文史哲溯源（學人卷I）

主 編 / 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連婕妤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114內湖區舊宗路2段121巷19號（紅螞蟻資訊大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5年4月 BOD一版

定價：36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5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學人卷I 目次

序 「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之緣起及規劃／廖伯源 003

序／楊祖漢 006

編者序／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 008

第一章 錢穆新史學理論的創建及其與傳統史學的關係／徐國利 020

第二章 錢穆與港臺新儒家交往述略／陳勇 043

第三章 關於「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的哲學解釋／盧雪崑 072

第四章 論牟宗三先生對王塘南「透性研幾」的詮釋／韓曉華 088

第五章 北學南移：現代新儒家的遺民情結及其價值——以唐君毅為例／
何一 110

第六章 唐君毅及牟宗三兩位先生對《楞伽經》中如來藏思想的詮釋
／岑詠芳 125

第七章 牟宗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詮釋／楊祖漢 138

第八章 唐君毅對船山「心性理氣」概念之闡發——以《中國哲學原論·
原教篇》為例／蔡家和 153

第九章 從「實現之理」及「形構之理」論牟宗三先生及唐君毅先生對中
西形上學之了解與會通／周國良 170

-
- 第十章 以「心具衆理」作為詮釋「心」之意涵的起點：不同於牟宗三的
「詮釋進路轉向」探究／賴柯助 191
- 第十一章 牟宗三的生命與學問／周栢喬 223
- 第十二章 朱子讀書法的工夫進路——以唐君毅的朱子學詮釋為考察
／呂銘歲 229
- 第十三章 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對惠施歷物學說析論之比較
／楊俊強 247
- 第十四章 從錢穆、唐君毅釋「誠明」看新亞的教育理想／何仁富 261

北學南移

港台文史哲溯源

(學人卷I)

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主編

序 「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之緣起及規劃

新亞研究所所長

廖伯源

一

香港新亞研究所、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辦「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將於二〇一三年八月廿九—卅一日三天，假香港樹仁大學及新亞研究所舉行。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政權轉移，馬列共黨當道。不少學者避居香港、臺灣，憂心中國傳統文化之衰落以至滅絕，故辦學興教，宣揚傳統中國文化，傳道授業，培植中華文化之靈根，此為新亞書院與新亞研究所建立之背景。此二機構所聚集之新亞學人，以溫情與敬意研究中國傳統典籍與文化，並反思近世中國之困厄，求索中國文化之出路。此輩學人，指出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之發展，必有重大之貢獻。此學術思潮之發展，乃有日後「當代新儒家」之名目。

二

民國以來，中國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之發展，深受西方學術影響而日趨現代化。一九四九年之變動，避居香港、臺灣之學者言傳身教，造就人才；今日香港、臺灣之人文學者，多為當日自北南來學人之弟子或再傳三傳弟子，此兩地之學術發展，實繼承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陸之學術基礎而發揚光大。反之，一九四九年後之大陸地區，以政治掛帥，政治領導一切，學術為政治服務，數十年間，文史哲及社會科學等皆不得自由發展，停頓枯萎，至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始逐漸復甦。一九四九年之變動，對香港、臺

灣學術界而言，可謂「北學南來」，而對整個中國學術界而言，則是「北學南移」，實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之重大事件。

三

數年前，新亞研究所在臺灣之校友茶聚，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鄭永常教授語及：一九五〇年代，不少來自大陸之學人在香港創辦學校，傳道授業，此事件為香港教育文化史之大事；而研究南來學者之生平學術及其創辦之文化機構，意義重大云云。我有同感。二〇一一年秋，我回母校新亞研究所服務，熟悉工作數月後，遂提出於二〇一三年暑期舉辦「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之計劃。

四

錢穆先生於一九五三年創辦新亞研究所，為新亞書院之附屬機構，蓋為培養中國文史哲學科之大學師資。二〇一三年為新亞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故研究所計劃舉辦「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作為六十周年所慶系列活動之一。新亞研究所自一九七四年脫離新亞書院後，接受臺灣教育部資助，招收碩士研究生不斷，一九八一年更增辦博士班。一九九七年後，來自臺灣之資助減少，二〇〇三年更完全斷絕。此後，新亞研究所惟賴學生之學費經營，不足之數，則依賴新亞教育文化會之基金挹注支持。然基金數量甚小，僅用作支持教學營運之必要開銷，研討會乃額外籌辦之事項，實不宜動用基金。故初步構想，研討會之講員與聽眾，皆以新亞研究所之校友為主，就「北學南移」之題目，舉辦若干場演講及座談會，地點在本所之誠明堂，不需費用，而達到研討學術之目的。

五

此構想揭露之後，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及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皆有意合辦此研討會。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楊祖漢教授為本所校友，謂該校有研究基金，可以資助中文系及哲學系約十餘位教授來港參加會議之旅費及住宿費，會後如出版論文集，該校可按出席人數之比例攤

付出版費。樹仁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羅永生教授謂該系原有研究「新亞研究所史」之計劃，而樹仁大學亦可提供研討會之會場及外地學者之住宿客房。經三方會議，決定由三方共同組織籌備委員會，合辦「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

「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以廖伯源、楊祖漢、羅永生、黃兆強、張偉國、鄭永常、李啟文、區志堅為籌備委員，規劃籌備會議。「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研討之子題如下：南來學者之生平與學術。南來學者之教育文化事業。「當代新儒家」之思潮。新亞書院與新亞研究所之歷史。新亞研究所校友及各方學者有意參與「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者甚眾，其中五十四位將於會議中宣讀論文。

六

「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之議程規劃，請參看：

newasiaiacs.wordpress.com

*RH2290

序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楊祖漢

廖伯源兄接掌新亞研究所之初，便提議舉辦學術會議，以慶祝新亞研究所成立六十週年，會議的名稱從「北學南來」，改為「北學南移」，大概是用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中所說「中國文化經濟重心的南移」之意。的確，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此後之三十年是中國傳統文化備受摧殘的時代，而香港、台灣則成為有幸逃離大陸的中國知識份子托命之地，如果沒有港台學人的艱苦奮鬥，中國文化能否像現在於神州大陸有再起的機運，是誰也不敢肯定的。從此意來看，北學南移，或中國文化的重心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已經移到港台，是說得通的。而且即使是開放改革了三十多年的現在，中國大陸是否已恢復作為中國文化的中心的地位，還是令人懷疑的。如果沒有真心肯定傳統的中國文化，不肯定儒學是中國文化的骨幹，而且進一步順著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開出民主、法治的精神，傳統的中國文化精神便不能真正的在現在的中國土地上昂首挺立。故如何使現代的中國真正體現中國文化，表現從古到今一直都存在的活的中國文化精神，是往聖先賢的共同願望。儒道佛三教及中國的傳統史學、文學與藝術的精神，都表現了高度的理性與智慧，那裡有以理性的精神為內容的文化思想會反對民主、法治與科學？如果中國文化的重心真正回到大陸上，則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堅持的文化理想、人文精神必須在大陸上重新作主，不然此一北學南移的趨勢不會停止。

這次會議得到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參與主辦，使得遠來的學者能夠順利出席會議，做了深度的學術交流。對於樹仁大學，尤其是該校歷史系的仗義幫忙，吾人十分欽佩與感激。國立中央大學香港研究中心為了支持此一會議，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仍支持了中央中文系及哲研所的師生七人

參加，又提供了會議印製論文及一些雜支的費用，我們對香港研究中心的主持人李誠教授，特表謝意。

編者序

編輯

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

香港學術文化的特色既傳承自中國傳統文化，又吸收西方文化，漸漸形成一種東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從香港的新界祠堂及學塾，已見香港蘊藏的中國文化乃傳承自中國內地，隨很多學者相繼自內地遷往香港，進一步把中國傳統文化廣披香江；另一方面，自清末、民初，中國出現的新文化、新學術、新史學和新思潮，及後也隨學人南下，更把新文化與傳統文化流播香港、澳門、臺灣及東南亞等地，南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又與香港的歷史文化相融合，也因南下學人執教港、臺等地高等院校，把學術靈根繁殖香港，培育年青一代學者，「北學南移」成為一時精神的重要特色。同時，隨早前南下的當代學人，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牟潤孫、全漢昇、嚴耕望、王德昭、郭廷以、余英時等學者的著述，相繼在中國內地重新出版，使早前在港、臺的學術研究成果及觀點，得以傳返內地，故有學者提倡「南學北移」之論。談及一九四九年初「北學南移」對香港、臺等地的影響，不可不注意新亞研究所及整個新亞文化事業的發展，新亞研究所及新亞書院更是當代新儒家發展的基地，新儒家學人首先在新亞相聚，結合成量，其後更成為影響海外的鵝湖學派，新儒家學脈得以廣傳海外，新亞研究所及新亞書院，極具貢獻！今天處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相信是一個重要的時刻，為學界提供一個討論平台，總結上世紀「北學南移」的學風，正值二〇一三年為新亞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故研究所計劃舉辦「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作為六十周年所慶系列活動之一，因感新亞學人不獨對香港的歷史文化教育貢獻甚大，畢業生日後均任教海內外的高等院校，也於國內外延續新亞辦學精神，居功至偉！香港樹仁大學歷史也是以推動歷史文化教育為己任，更深刻地感受到新亞辦學精神對啟導香港文化教育的重要，自是義不容辭地與新亞研究所，及臺灣的

中央大學文學院於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合辦「北學南移國際學術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得到中國內地、港、臺及海外學者參加盛會，惠賜鴻文，在此謹代表大會先向各位與會者致以衷心感謝，更代表大會向新亞研究所及中央大學文學院，感謝給予合辦是次研討會的機會，因為各人的努力，使是次研討會得以順利舉行。在是次研討會之後，各位與會者均贊成出版論文集，保存是次研究成果。有關是次論文集內各位學者的觀點，現概括如下：

其一，通論及宏觀北學南移發展的論文，多述及一九四九年前後中國學者及學風自北方遷往香港及臺灣的流播情況。呂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在〈「文化跨海」：戰後初期臺灣學術與文化走向——以許壽裳、傅斯年領導的機構為例〉一文，研究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國戰勝日本，隨著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民國政制及文化跨海而往臺灣，許壽裳受命創辦臺灣編譯館，使中華文化在臺灣廣播，至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與蔣介石遷臺，臺灣成為民國政府托命所寄，中國文化也以完全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命運而延續，傅斯年也於此時主持臺大，傅氏辦學既上承日人辦學的傳統，也具有五四以來學術自由、教育獨立精神，此文尤可以呈現臺灣在二次大戰後，文化與政治的互動關聯下，重塑臺灣社會文化的面貌。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在〈當代新儒家之課題與發展：論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先生之學思方向〉，指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位先賢從中國大陸撤走至港、臺時，正值四十的壯年，唐、牟二先生在哲學界早具名聲，他們視港、臺為暫避戰亂之地，牟先生曾慨歎是否要遠走新加坡，存中國學脈於海外，然而他們對發揚中國文化，歸宗儒家，樹立心懷宇宙的典範，均具貢獻！廖伯源（新亞研究所）在〈錢穆先生與新亞研究所〉一文，宏觀地研究過去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發展，突出五十年代南來學人如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學者，任教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情況，並研究錢先生帶領下，新亞學人的凝聚、南來學人治學方法、新亞的課程設計、學人培養，與學風形成的關係。陳學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發表〈從「失養於祖國」到「被逼回歸」：南來與本土論述中的香港變貌〉，從域外殖民者、南來香港的文化人與作家，本土論述中的文學作品與評論等，觀察香港從過去到現在的歷史身份塑造問題，及自我認同趨向問題，展示一個從早期「失養於祖國」的「壓

抑」到回歸前後「被逼回歸」的「反抗壓抑」思想發展脈絡，進而反思目前香港的定位與走向。劉建平（西南大學文學院）在〈當代新儒學的「西遷」與「南移」〉一文，指出當代新儒家的「西遷」和「南移」為二十世紀的重要事情，「西遷」的新儒家「價值闡發」也為「南移」後新儒家的「價值重構」，確立理論及思想基礎。

其二，也有論文研究自北方南下學人及作品對地域學風的影響。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發表〈北學南來的地域文化反思——談1927年的《魯迅在廣東》〉一文，指出一九二〇年代中期，魯迅成為新文學陣營的代表人物，因魯迅嚴厲批評北京腐敗政治人物，致有南下廈門大學及中山大學之舉，此文研究一九二七年鍾敬文編《魯迅在廣東》內多篇論文，以見南北地緣與新舊學問的觀念分歧，和近代中國在轉折期內微妙的學術變化。許振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研究二次大戰後香港為不少學人避地南來的駐足點，香港大學的中文系與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為戰後其中一批南來學者的匯聚地，他們的貢獻為戰後復校的香港大學中文系確立發展基礎。姚繼斌（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的〈南來學者與國史教育：以1950年前後香港教師會出版刊物為中心〉一文，指出香港教師會創辦於一九三四年，為早期香港的重要教師組織，此會於一九五〇年前後出版刊物 *Common Room-Monthly Magazine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 Association* 和 *The Path of Learning-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 Association*，此兩份刊物為南來學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發表歷史教育論文的園地，他們的言論對國史及文化教育均甚有影響。鄭永常、范棋崑（成功大學歷史系）在〈戰後（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對學術人才培育之貢獻〉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國內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及經濟困難，不少來自內地高等院校，相繼在香港復校，有些學者更認為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十三間私立高等院校，而且不少私立高等院校在臺灣教育部立案，又擴建發展研究所，自過去至今，香港一地的私立高等院校均為培養港、臺二地人才的重要地方。區志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發表〈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一文，指出新亞創校精神及辦學宗旨，既指示新亞辦學團體的發展方向，而且師生在校園生活也實踐新亞精神，作者研究一九五二至五七年新亞知識群體出版《新亞校刊》，尤注意此刊物記載新亞師生的生活，引證新亞師生不獨過著「吃苦奮鬥」的生活，更在生活中實踐了

「新亞精神」及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活動，還有，在《新亞校刊》發表文章的年青人，不少成為影響港、臺等地的重要學人。

當然也有學者發表一九四九年後，隨北學南移之風，對臺灣歷史文化教育的影響。李元皓（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從北京到臺北—京劇《硃砂痣》演出變遷考略〉一文，表述了《硃砂痣》首見於一八八七年代刊行的京劇劇本集《庶幾堂今樂》，《硃砂痣》後為京劇後三傑的常演劇目，並為孫菊仙「孫派」的代表作，及至一九五〇年代孫派風格僅保留在臺灣，成為僅存的孫派完整全劇錄音的資料之一。侯勵英（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的〈陶鑄後進：郭廷以與學生的學術承傳〉表述一九四九年前，已就讀東南大學及任教中央大學歷史系的郭廷以，其後隨國府遷臺，任教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和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郭氏致力培育臺灣史學的發展，尤注意為研究近代史學人才的培訓工作和建立近代史學研究的學術制度，確立下中研院近史所為臺灣和國際學術界的重要地位。

其三，談及學術自北南移，要注意學風傳承與創新的研究課題，這樣便要研究個別學人的治學觀點。

新亞知識群體在香港辦學，日後也使香港成為宏揚新儒家思想的中心，促使香港歷史文化在國際學術上，扮演了一個把傳統文化植根香江，又把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這樣必要談及學人治學觀點和其研究方法，與塑造一代學風的關係。研究新亞學人的文章，有徐國利（安徽大學歷史系）的〈錢穆新史學理論的創建及其與傳統史學的關係〉一文，研究錢穆先生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發表〈論近代中國新史學之創造〉等四篇文章，其後也發表多篇文章闡述歷史的本質及特性，錢氏倡導的新史學既有傳統史學的因素，也呼應民國新史學界提出的觀點。陳勇（上海大學歷史系）在〈錢穆與港臺新儒家交往述略〉表述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與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復觀等學人的交往，和他們對文化關懷，考察一九四五年錢氏拒簽〈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原因，並分析錢氏與當代新儒家治學理念及思想相異之處。宋敘五（新亞研究所）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北學南移潮流中的張丕介先生與楊汝梅先生〉以兩人合傳的方式，把張丕介先生及楊汝梅先生合傳，並述二位先生在南下香港之前的成就，同時，也談及二氏來港後對香港社會及發揚新亞文化的貢獻。李學銘（新亞研究所）在〈牟潤孫先生與「南來」之學〉一文，研究

牟潤孫先生治史的觀點與陳垣先生及柯劭忞先生的淵源，並述及牟先生秉承師教，以北方所學，南下香江教導學生，使北學南下，又略述牟先生為香港培育史學人才的貢獻。梁耀強（新亞研究所）在〈羅夢冊教授——站在二十世紀中途——論析中國社會形態〉研究青年時的羅夢冊先生，已致力推動中國新文學運動，三十年代羅先生更研究中外法制，四十年代的羅氏更成為「主流社」的領導者，並撰述《福利宣言》，而居港後的羅先生籌辦《主流》雜誌，致力推動民主政治教育。官德祥（新亞研究所）發表的〈我印象中的嚴耕望教授〉一文，記述了作者受學嚴耕望先生的情況，也闡述嚴先生研究中國史的精義，此文對了解嚴先生治學風貌及精神，甚有幫助。

還有，研究新儒家學者的文章，有盧雪崑（新亞研究所）的〈關於「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的哲學解釋〉闡述朱子提出「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的觀點，並從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觀點，作進一步的引伸。韓曉華（新亞研究所）在〈論牟宗三先生對王塘南「透性研幾」的詮釋〉一文，先指出牟先生曾評論黃宗羲對王塘南詮釋「良知」是「最為諦當」的說法，再依此研究牟先生對王塘南「透性研幾」的定位，從而得見牟先生判語的真知灼見。何一（宜賓學院政府管理學院）發表〈北學南移：現代新儒家的遺民情結及其價值——以唐君毅為例〉一文，指出唐君毅先生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表現在清理傳統文化，繼續傳統文化的價值及實踐，保持了華人世界東西文化生態的平衡，保留了公共知識份子的存在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岑詠芳（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在〈唐君毅及牟宗三兩位先生對《楞伽經》中如來藏思想的詮釋〉一文，表述作者以個人受學於唐、牟二先生的經歷，又引用二位先生的著作，得見二氏詮釋《楞伽經》中如來藏思想的相異處。楊祖漢（中央大學文學院）發表〈牟宗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詮釋〉一文，認為牟宗三先生對朱子學的衡定，可以作出微調，作者更認為從康德與朱子，孟子與陸王二種學術系統，既可以會通，也是儒學發展的兩個不可少的義理型態。蔡家和（東海大學哲學系）的〈唐君毅對船山「心性理氣」概念之闡發——以《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為例〉指出唐君毅先生於《原教篇》闡述船山學的理、氣、心、性、才、太極等概念，又認為先生的船山學，是準確而能合於船山的本意。周國良（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發表〈從「實現之理」及「形構之理」論牟宗三先生及